

政大六十年來之成長與成就

胡春惠

(作者為政大歷史學系專任教授)

引言

國立政治大學創立於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日，於今已屆六十花甲子之年。其間校名雖有「中央黨務學校」、「中央政治學校」、「國立政治大學」之變易，但其「各憑忠愛」、「共勵知行」的學統，以及創校以來師生們「親愛精誠」的精神，則是始終如一。今逢政大六十週年校慶前夕，特就政大成長過程，及其對國家社會之貢獻，作一史的論述，以資紀念。

一、中央黨務學校時期

民國十六年春天，國民革命軍在北伐中已底定了長江流域。當時軍閥勢力接近崩潰，完成統一的曙光在望，不料被容於革命陣營中的共黨份子，卻想趁軍事進行之空隙，來竊奪勝利之果實。彼輩除在國民政府內部實行分化伎倆外，更在剛行光復之上海、南京、南昌製造暴亂，在兩湖及江西等地搞工農運動，挑起社會糾紛，以圖奪取革命之領導權。而北方軍閥孫傳芳、張宗昌部在新敗之餘，也極思伺革命陣營寧漢分裂之機，對南京一帶實行回噬反撲。當此革命事業，在軍事上北伐中挫，在政治上危機四伏之際，如何宣揚三民主義，使民衆對之有認識，如何加強黨之基層組織能力，使內足以完成清黨工作，外足以奠定打倒軍閥、統一全國之基礎，便是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中央當務之急。因而身負組織責任之陳果夫先生，便邀晤戴傳賢、丁惟汾等先生籌商，建議中央成立一培養黨務幹部之學校，用以培養清黨建國、宣揚三民主義之基礎人材（註一）。

民國十六年五月，滬寧等地已全面展開清黨工作，此時中央宣傳部正向中央提議設立一「宣傳訓練院」，經中國國民黨第

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及各部部长第八十八次聯席會議仔細商討後，決議設立「中央黨務學校」，並推舉葉楚傖、陳銘樞、曾養甫先生等五人負責籌備。到五月二十日的中央第九十二次常務會議時，中央再正式決議任命蔣中正先生爲此一新設之中央黨務學校校長，並加派陳果夫、丁惟汾、戴傳賢先生爲籌備委員，使中央黨務學校的建校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註二）。

中央黨務學校成立時，校舍是先行借用東南大學的一字房、田字房和梅庵等處，由戴傳賢先生爲教務主任，羅家倫先生爲副主任，丁惟汾先生爲訓育主任，谷正綱先生爲副主任（註三），陳果夫先生爲總務主任，吳挹峯先生爲副主任。校章中並規定有一校務會議之設置，以校長及六位正副主任構成之，負責決定學校之重要事項（註四）。在籌備創校期間，先由中央黨部撥發經費銀元三萬零二百元，到三個月後的八月，再由中央撥下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一銀元，作爲民國十六年度之經費，以供各項開支之用（註五）。當時決定第一期招收學生二百人，除學校直接公開招生之外，並得由各省黨部保送部份學生入學，唯爲嚴格要求學生入學之水準，保送生必須再經覆試。經過七月十九日與八月十五日兩次招生考試，在與試者近二千人中，因應情況錄取三百一十四名學生入學（註六）。當時學生在校之學膳住宿制服講義及零用錢，每年均由中央按每名四百九十元之標準撥發，故入學學生均能安心致力於學業。加以當時正值北伐中途，面對荼毒百姓軍閥和內部共黨的夾攻，青年們內心中所激起的革命狂熱，一種努力向前的使命感，使他們確能把握自己，努力學習，以肩負起推動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時代責任。

民國十七年二月，中央黨務學校遷入南京建鄴路紅紙廊的前清江蘇法政學堂舊址，中央黨務學校自此有了永久校址。同時因爲蔣總司令回任的關係，革命大局一切好轉，黨校前自成立來，在中央特別委員會部分人物歧視下的待遇，乃獲得改善。此時蔣總司令正率師展開第二期北伐工作，爲了配合軍事之進展，在中央黨務學校學生中，選派一部份北方籍學生七十九人，隨軍到前線推展戰地政務及宣傳工作（註七）。黨校第一期學生修業時間本定爲六個月，因再決定延長爲一年，所以第一期之畢業典禮是在民國十七年六月五日舉行，蔣校長在軍事倥傯中，特趕回南京親自主持（註八），並訓勉學生「要廉潔、要勤儉、要有毅力、要有責任心，以身作則，民衆才會信仰你們，接受你們的領導」（註九）。第一期畢業生共二百五十二人，由中央分發京、滬及蘇、浙、皖、贛、鄂、湘、蜀、粵、桂、閩、冀、魯、晉、隴及海外等地，擔任推動黨務工作。第一期學生畢業後，黨校即開始作第二期新生之招考，錄取名額擴大爲四百一十名，而隨著革命勢力之擴及全國，也分別在南京、上海、廣州、武昌

等地舉辦入學考試，同時爲了事實需要，也將肄業年限延長爲兩年，以便學生接受較完整之高等教育。

中央黨務學校之誕生，是在一個革命事業十分危急的時代，此正如陳果夫先生在「中央黨務學校第一期畢業同學紀念冊」中所說：「當斯時也，北伐之功未竟，黨務之糾紛以起，在湘、鄂、贛則有共產黨之擾亂，爲本黨心腹之大患；在長江下游諸省，則因黨務幹部人材之缺乏，使黨務不能隨軍事勢力進展，而空虛散漫之象以生。本黨至此，非毅然清共，不能挽回革命之危機；非鞏固黨基，亦無以達革命成功之目的，於是中央有設立本校之決議，蓋深信黨務較軍事尤爲重要。」（註一〇）也就是說黨務學校設校之目的，乃在爲革命進行中之中國國民黨，培養一批有推展黨務發展之熱情，對三民主義革命目標有認識，能夠肩負起組訓民衆工作之黨工幹部爲方向。因此中央黨務學校在訓練內容上，除了安排一般大學中之政治、法律、歷史、哲學外，對於黨史、三民主義、國際關係、民衆組訓、農民問題，以及軍事學科，尤其重視，這正說明「中央黨務學校」本身，有一種軍政時期獨有的特色（註一一）。

二、中央政治學校前期

民國十七年冬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後，國民政府宣布進入訓政時期。依照中山先生「建國大綱」及「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的規定，訓政時期之主要工作，乃是訓練人民行使四權和推動地方自治。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國國民黨三大大會通過「確定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案」，內中明定，爲造成中華民國之憲政基礎，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應「培植地方自治之社會的基礎，宣傳訓政之方針，開導人民接受四權使用之訓練，指導人民努力完成地方自治所必備之先決條件，並促進一切關於地方自治之工作。」（註一二）。爲了迎接此一時代使命，經由黨校蔣校長及戴傳賢、陳果夫先生三人之提議，第三屆中央常會在民國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的第十九次常會上，決議將「中央黨務學校」校名改爲「中央政治學校」，同時在學校組織上，增設一校務委員會及教育長，合併原先之教務、訓育兩處爲教務處，仍以蔣中正先生爲校長，丁惟汾先生爲教育長，余井塘先生爲教務主任，吳挹峯先生爲總務主任。中央政治學校改組後，在教育計畫中，也將學生修業期限延長爲一般大學修業四學年的同等情況，其中學生前三年在校上課，四年級第一學期分發到與學科有關的機關去實習，並蒐集

論文資料，第二學期仍然回校參與上課，研究和寫論文。中央政治學校所以有如此改變，這與它所負時代使命有關，與羅家倫先生的竭力建議有關，當然與模倣英國倫敦大學的經濟政治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和普法戰後法國巴黎政治學校(L'Eco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對社會和國家政治的傑出貢獻有關(註一三)。就在這一主旨下，配合訓政時期國家建設的需要，中央政治學校學生除在生活上實行軍事管理，學校的本科，也分設為政治、財政、地方自治和社會經濟四個學系。但是改制時間不到一月，因為國家需要，經校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又行增設教育和外交二個學系，並重行招考政校第一期的第二次新生，應試者千人，再錄取了六十七名補行入學(註一四)。

自民國十九年到抗戰發生以前，為國家十年建設的黃金年代，因急需建設之各項人才，所以本校得到迅速之發展。其間除在民國十九年七月附設一測驗工作人員養成所，接受各省市黨部保送學員，予以六個月之訓練外，又增設一蒙藏及華僑特別班，分別接受蒙藏委員會及僑務委員會選送學生，予以三年或短期之訓練，再分發蒙藏及海外地區服務，接着政校本科也更名為大學部，學系也經重行釐訂為政治、法律、財政、社會經濟、外交、教育六系，系下再按需要情況分為十四組。此時教務主任余井塘先生赴中央任職，羅家倫先生繼任，除著重培養實行方面的專才之外，對於學生一般應有之學養，也十分重視，在正常課業之外，分別規定每學年學生必讀一本以上之中英文名著選讀，定期考試，為其升級與否之參考(註一五)。這對於畢業生鍛鍊卓越的見解，與培養其宏毅氣度有莫大關係。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值「一、二八」上海事變以後，蔣兼校長正以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身分，在漢口主持軍事剿匪工作。一方面有見於收復後匪區土地問題之有待解決，而另一方面訓政時期既已開始，深感國父民生主義中之土地政策也極待推展，為了培養土地改革人才，蔣校長乃電囑中央政治學校籌辦地政研究班，聘請蕭錚先生為班主任。之後因蘇、浙、皖三省地政工作，漸次實施，民國二十二年五月，正式將地政研究班擴大為地政學院，仍由蕭錚先生負責，並由蔣校長指撥專款，於南京中山陵前，建築宏麗校舍，作為地政學院之講堂、宿舍、圖書館及研究室，形成了日後政大之新校區(註一六)。在地政學院稍後，政校於二十二年，又增設計政學院一處，聘王陸一先生為院主任，招考高級部會計、審計及統計人員三班。與此同時，北平蒙藏學校及東北蒙旗師範學生，因華北動亂，奉令交由中央政校收容，經由校務委員會議決定，將原有之蒙藏班，改為蒙藏學校

，聘何玉書先生爲校務主任，分高中、初中兩部及補習班，高中部分設普通、師範、畜牧、衛生四科，派員分赴北平、綏遠、青海、西康各地招考新生，到二十五年七月，校務委員會議決，再增設師範及蒙藏回語文兩專修科，以培植邊疆教育人才。

此外，「九、一八」以後，邊患益熾，邊防更形重要，政府爲了加強推廣邊疆之開發工作，在邊疆地區展開三民主義之教育工作，乃在民國二十三年二月的四屆第一〇八次中常會上，通過中央政治學校設置分校的初步計劃綱要，於張家口、包頭、迪化、寧夏、康定、麗江、蘭州、伊犁等八處，各設立分校一所，以教育邊疆青年。按上項綱要之規定，各分校應按實際情形，分期成立，原則上各分校應先辦簡易師範及小學，以造就邊區之義務教育師資，後經青海人士請求，第一一五次中常會再決議政校應增設西寧分校一所，第一七二次中常會又同意增設肅州分校一所，其中包頭、康定、西寧三分校先於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成立，而甘肅西北部之肅州分校，也於民國二十四年七月正式成立。四處分校成立後，均僅辦理簡易師範部及小學部，以應當地需要（註一七）。這是政校校史中爲配合國家實邊政策，而顯現出的又一特色。

爲增進學術研究，適應社會需要起見，政校校本部除在民國二十四年元月增設新聞系之外，於同年二月呈准中央設立研究部，其研究範圍分行政、法律、經濟、財政、外交、教育等組，一方面作國策之研究，以供國家中央之參考，一方面集合大學部畢業生在各地工作之報告，綜結分析其實際狀況及利弊得失，充作解決問題及日後教學之參考（註一八）。該部主任初由教務主任程天放先生兼任，後程先生因出使德國關係，改由教務主任劉振東先生兼任。對於羅致專門人才，提出各類研究報告，均著成效，也爲我國大學兼負研究發展責任樹一先河。

合作主義思想，爲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世界重要潮流之一，也是解決社會貧窮問題的有效途徑，因而中央黨務學校成立之初，即由余井塘先生在校開設「合作運動」之課程。民國十八、九年的共黨叛亂和天災，更使皖贛豫鄂江蘇等地之農村經濟相繼破產。爲了對抗共黨倡導之階級對立，爲了實現中山先生民生主義之理想，經由薛仙舟及陳果夫先生之倡議，中國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通過了「本黨應特別提倡合作運動案」（註一九），加以此時北京之華洋義賑會、南京之金陵大學、上海商業銀行陳光甫先生等公私團體的努力，合作運動及農村合作社的組織在各地紛紛出現，陳果夫先生爲了大量訓練合作運動人才，特提請中央常會准予在中央政治學校設立「合作學院」，招收相關科系大專畢業生，施以兩年專業訓練，以配合建國之需要。政校奉准後

，即聘請丁惟汾、陳果夫等八位先生爲籌備委員，釐訂章則，編審課程，勘定院址，於民國二十五年一月聘壽勉成先生爲院主任，招生開課。

從前述之史實中，可知政校設校，除讓學生能了解各科學理之外，更重實際經驗之磨練。而建校之後，即逢政府訓政之展開，訓政建設，尤重縣地方自治之推動，因而乃由中央先後命令江蘇省將江寧縣，浙江省將蘭谿縣改爲實驗縣，縣長分別由政校之教授梅思平、胡次成先生擔任，中級佐治人員也由政校之畢業生擔任，以便樹立縣自治之楷模與進行有關之實驗工作。當時之實驗範圍，分爲兩端：一爲縣政機構之實驗，二爲縣政工作之實驗，皆以達到改進三民主義縣政之目的。其實驗之依據，則全以中山先生之「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爲準則，自民國二十二年到民國二十六年，分別在兩縣展開整飾治安、清查土地、整理財政、辦理戶口、修建道路、開辦衛生等建設，其結果，不僅使新縣制之理想獲得肯定，引起全國朝野之重視，而政校師生，也能以此將理論與實際應用相結合。

顧政校自民國十六年創校到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年期間屢經發展，學校已漸由一短期之訓練學校，而擴展爲有研究部、大學部和各種特別班燦然大備的大學學府。其先後入學之學生，除原黨務學校第一屆外，計有大學部九期，地政學院六期，計政學院六期，合作學院二期，蒙藏及華僑特別班一期，蒙藏班二班，華僑班一期，西康班一期，測驗工作人員養成班一期，蒙藏學校專修科及高初中共十三班，各邊疆分校簡易師範部七班，初中部三班，小學部八班（註二〇）。當訓政時期，全國剛行統一，建國工作展開，政府需才孔急之際，政校爲黨爲國作育才，對於建國大業之貢獻，可說是十分卓然。

三、中央政治學校後期

正當國家建設工作蒸蒸日上，政校校務蓬勃發展之際，日本軍閥突然發動了民國二十六年的蘆溝橋事變，使政校不得不隨政府西遷。此時教育長丁惟汾先生請假，乃由陳立夫先生暫行代理。政校師生先於民國二十六年九月遷到江西廬山之傳習學社上課，未及三月卻因戰火關係，再經長沙常德而遷到湖南西部之芷江。二十七年二月因立夫先生調任教育部長，中央乃任陳果夫先生爲政校之教育長。於是果夫先生親自入川，勘定四川巴縣小溫泉、南溫泉及白鶴林爲新校址，全校師生乃由湖南貴州跋

涉入川，並於九月十五日在新址開學，至此政校在抗戰砲火及日機轟炸下，又邁入弦歌不輟之新氣象中。

本來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的時代，部份黨國領袖即有意將政校變為一純粹的政府公務人員養成學校，意將各大專學校已畢業之學生，經過政府任用考試及格後，再納入政校，施以任職前之正規訓練，使政校能名符其實地成為建國幹部之訓練院（註二）。所以在重慶時代，政校又循此構想增設了公務員訓練部，分高等和普通兩科，訓練高等、普通考試考試及格人員。後來爲了在職司法人員的進修，於公務員訓練部中，又設立了法官訓練班，大學部也增加了地政和新聞系。民國三十二年，政校又成立了中國空前的新聞學院，培植高級新聞人才，俾能加強戰時對外宣傳及報導工作。加上原有之地政、新聞、語文、統計等四個專修科，使抗戰期中的政校人數，比之南京時代更爲擴大四倍，成爲抗戰時期最大的大學之一，每年招生時，雖然大學部祇錄取五百名學生，但報考的人數，總在一萬人以上，可見政校在重慶時代鼎盛之情況（註三）。

政校在重慶時代，校址十分廣濶，大學部設在重慶南郊的風景區小溫泉，是許多山峯中的一塊平地，佔地約四百畝，建有圖書館、辦公廳、大禮堂、教室和宿舍，校園樹木成蔭、羣花燦爛如錦，校旁有一道花溪流過，環境安靜清新；公務員訓練部設在南溫泉附近的仙女洞，離開小溫泉約兩公里多，臨近市鎮；研究部則設在離南溫泉四公里的白鶴林，沿途都有秀麗的風景，被認爲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學院環境。

抗戰期間，政校教育的內容，仍是著重於社會科學方面，除主持政校教育行政的校長，校務委員、教育長等均爲國家領袖和黨國元老，以革命精神、政治修養來召感薰陶同學們的品德外，而教授們如王世杰、劉振東、方東美、謝瀛洲、胡長青、左舜生、陳石孚、郭廷以、薩孟武、張金鑑、蕭錚、朱建民、湯惠孫、端木愷、趙蘭坪、程其保等，均爲學界一時之選。政校雖然在當時是屬於中國國民黨所辦的一所學校，但是對學術自由的意義，卻仍然十分重視，因而在延聘教授時，也不以國民黨籍或某一學派學者爲限，如請青年黨籍的左舜生、陶元珍教授歷史，北大的周炳琳爲教務主任，賀麟講授哲學都是明顯的例子（註三）。此外政校之研究部，更能在學術研究上，發揮其貢獻。蓋在民國二十四年研究部成立以後，即能網羅歐美留學回國之專才爲研究員，按期發行「政治季刊」一種，在戰前即爲當時最富學術價值刊物之一種，而研究員程其保與助理研究員經小川合著之「我國教育問題之分析」，「社會學教學法研究」，孫本文、焦如橋合著之「中國社會進步」，焦如橋著之「縣政資料

彙編」，洪軌著之「贛南匪區經濟研究」，均係根據資料，慎加整理之鉅著，對於建國時期基層社會政治建設，有很大參考價值。

抗戰軍興，政校西遷重慶之後，先後由陳果夫、張道藩及程天放先生為教育長，特請劉振東先生專任研究部主任，陳石孚先生為副主任，積極開展研究工作，除繼續出版「政治季刊」外，又創一「新政月刊」，於國家建設事項，提供具體意見，對各級政府之施政，影響也大。其中如民國三十年中央決議實行鹽、糖、蒜頭、火柴、茶葉六種日用品專賣以裕戰時財政，此項專賣案之設計研究，財政部孔祥熙部長即係交由研究部劉主任負其全部專責。此後研究部主任改由薩孟武先生擔任，民國三十二年再以程天放教育長兼任主任，張金鑑先生任副主任，仍均能按原定計畫進行研究。總計重慶時代，研究部除了編纂「國父遺教彙編」，供各級學校教材之用，以匡正戰時龐雜之青年思想外，另外完成之著作專書與研究報告，尚有：劉振東之「美國抗戰建國史」，「預測德國突擊俄國意見書」，馬大英之「中國財務行政論」，「地方財政」，張金鑑之「均權主義與地方制度」，朱建民之「侵略問題之國際法研究」，「近代哲學家的戰之謳歌」，周子亞之「戰爭在國際法上之意義」，「外交行政與外交監督」，隋珍夫「中國手工業改進之途徑」，「陝西建設計畫之研究」，「廣西建設考察報告」，王文萱之「貴州苗民考察報告」，「移民邊疆問題」，沈中臨之「日本國家總動員計畫」，劉炳炎之「戰爭與紙幣」，羅少申之「四川鹽業考察報告」，許醜農之「四川財政考察報告」，以及集體研究之「各國人事考核制度」，「三民主義新縣制的研究」等數十種，均斐然可觀。這些研究成果除公開發表外，並將研究成果，繕呈中央，由蔣校長親自批交各院部會參考辦理。甚至政府遷臺後，在臺灣實行之「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及都市平均地權案，也均為當年政校研究部地政組研究下所奠定之理論基礎（註三四）。

四、改制國立政治大學時期

「中央黨務學校」及「中央政治學校」的產生與擴展，代表中國國民黨遵照中山先生「建國大綱」實行訓政建設的一環。也就是以這個學校為搖籃，訓練一批建國人才，去負起訓政時期，「克盡本身的職責，能革新中國政治，實行三民主義，建設一個真正現代的國家」責任（註三五）。蓋當時的中國，正處於中國國民黨以黨治國以黨建國的時代，所以中央政治學校乃是一個

直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黨校，因而校長一職，也是由中國國民黨的最高領袖親自兼任。民國三十四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國國民黨立即預備結束訓政，早日還政於民，所以決定在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使中國能早日進入憲政階段。爲了配合憲政時期之到來，結束黨治，中國國民黨六屆中央常會也在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七日的第三十七次會議中，決議將中央政治學校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併，然後依大學法之規定改爲大學，使之隸屬於教育部，並定名爲「國立政治大學」，仍由蔣中正先生擔任校長，段錫朋先生爲教育長，並仍設校務委員會之組織。

政治大學前身之一的中央幹部學校，原爲三民主義青年團設立的全國幹部訓練班，而在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一日正式成爲「中央幹部學校」，校長由蔣中正先生兼任，教育長則爲蔣經國先生，至於學生分研究部與政治科及專修部，研究部乃爲分別在西安、成都、桂林、昆明、貴陽、曲江、耒陽、重慶等招考之大專畢業生，修業期限爲一年，而後分發各地工作，研究部先後畢業有兩屆合計約四百多名；政治科則以原三民主義青年幹部訓練班爲第一期，第二期則以青年遠征軍政工班、遠征軍政工東南分班、東北青年幹部訓練班、西北青年訓練班合併而總稱之；此項政治科人數，共計約二千二百餘名，肄業期間由數月到一年不等，均在造就國家之基層青年領導人才。至於幹校之專修部，則分爲地方自治、計政、墾務、管理、師範五科，修業期限爲兩年，畢業後均經分發各地青年中學及三青團支團部、西北行營、臺灣長官公署等地服務，對戰後全國復員工作，均有相當貢獻（註二六）。

當中央政治學校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併爲國立政治大學之時，也正是抗戰勝利全國復員政府還都之日，政校師生立即分批遷回南京紅紙廊原址，並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在南京正式開學上課。不久教育長段錫朋先生因積勞成疾，由蔣經國先生代理教育長職務。此時政大既已改隸教育部而爲一國立大學，中國國民黨六屆中央第八十二次常會中，經戴傳賢先生等提議，認爲蔣主席以國家元首身份，兼任一國立大學校長，在體制上諸多不便，應由教育部聘一專任校長主持校務，但仍可恭請蔣中正先生爲名譽校長以保留政大之歷史精神，至於教育長職位與原有之校務委員會，自新校長就任之日起，可行裁撤（註二七）。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新任校長顧毓琇先生正式接事，從此國立政治大學便隨著國家政治的進展，而以一個正規的國立大學，致力於學術性專門人才之培養。

政校的使命既由黨治時代訓政人才的造就，進而變為憲政時代科學和民主建設貢獻者的培育，所以政大乃在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以普通大學在南京正式招收新生，然而仍因為政大以往有光榮傳統和輝煌成就的原因，雖僅招收數百名學生，報考者竟達萬餘人。此時政大在組織上也依大學法的規定分設了文學院、法學院和政經學院，研究部也同時配合改為法律、政治、經濟、外交、地政、新聞、教育和文史哲八個研究所。原有之公務員部及法官訓練班，則暫時保留。此時之教務長為陳石孚先生，後因病假由邱有珍先生代理，訓導長為楊希震先生，總務長則為翟楚先生，行政組織既悉依大學法規定，教授陣容也相對加強，除原有專兼教授外，因新實行學分制關係，加聘了蕭公權、沈剛伯、方東美等先生多人。與此同時進行者，乃是南京中山門外陵園前，新校舍之積極規畫與興建工作，自民國三十六年九月開工起，預計在三年內完成約可容納數千學生之新校舍三十餘幢，使新的國立政治大學，比紅紙廊時代，預計擴大達數十倍之多（註二八）。

正當政大師生一心一意的光榮傳統中力求學術化，以求更有貢獻於國家憲政之際，卻碰上共黨之擴大叛亂。民國三十七年冬，國軍在徐蚌會戰失利後，南京為之震動。此時蔣總統下野引退，政府陷於羣龍無首之情況，其他大學似皆無遷校之打算，獨政大同學在張金鑑先生等支持下基於反共愛國決心，不顧左派人士之威迫利誘，在缺少經費之支援下，毅然以旅行團名義，自動向杭州出發。政大師生到杭州不久，政府即宣布遷廣州辦公，在杭州師生一致要求下，政大決定再遷往廣州，此時顧校長因病請假離校，政大師生在訓導長楊希震先生率領下，再輾轉到了廣州南海附近之大壠墟。三十八年六月顧校長堅請辭職，而共軍之先頭部隊也已迫近廣州，楊希震先生在臨危授命的情況下，奉命代理校長。楊代校長為了促成政大遷校臺灣，曾親自來臺辦理交涉，無奈因格於政策，無法達成目的，最後經向同學解釋交涉經過後，決定仍然追隨政府西遷重慶（註二九）。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下旬，各政府機關已紛紛離穗撤退，政大師生也開始分為三批經梧州、柳州、貴陽、重慶西遷，在山河破碎人心恐慌的低氣壓下，經二十多天之舟車勞頓長途跋涉，終於又回到戰時政校之原址小溫泉。在半年漂泊，一路流浪之後，政大師生暫時又獲重回母親懷抱之喜悅。於是在「人不親土親」環境鼓勵之下，楊代校長竟能在兵慌馬亂之中，補請教授，使政大在小溫泉重行復課，而且能不顧時局之發展，繼續在四川招考一年級新生，重續弦歌。可惜好景不長，開學不及一月，戰局又告惡化，政大師生在風聲鶴淚中，以化整為零方式，或擠搭便車，或赤手徒步疾走成都。所幸政大同學均已有的逃難經驗

，在沿途皆是悲啼呼號慘不忍睹的情況下，逃抵成都者尚有四百餘人，承蒙當時四川大學校長黃季陸先生的鼎力協助，將政大師生收容在川大先修班宿舍中（註三〇）。然而此時整個國家局面，已呈瓦解之勢，前線國軍節節失利，社會上不少政客將領也多在準備投機靠攏的勾當，一心愛國的政大同學雖有滿腔的熱血，然而卻是「曲高和寡」，在面對如此的大局之下，已是山窮水盡徬徨無依的了。最後經楊代校長與同學們商議之後，男女同學一致決議投筆從戎，分爲兩途加入成都中央軍校和閩行政院長戰鬪內閣之警衛軍，爲國家作最後之奮鬥犧牲。

政大男女同學從軍後僅一週，共軍之主力劉伯承部即進逼川西，武裝後之政大同學在隨軍西撤途中之大邑附近，與共軍發生遭遇戰，倉猝迎敵，士不及壘。雖無作戰經驗，然政大同學仍能憑一腔熱血，以一種蹈厲奮發，無敵無畏之氣概，堅強不撓，在彈如雨下，寡不敵衆的情形下，六十餘人殉身爲國，多人負傷不退，其壯烈赴義忠黨愛國之精神，爲政大校史中留下光榮之一章。

五、在臺復校的政治大學

或者就因爲政治大學在國家大難中，常能表現出此種疾風勁草風格，政府在不鼓勵也不支持大陸各大學在臺復校的原則下，於民國四十三年破例地特准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北首先復校，這固然是政大校友們的努力及朝野人士對政大的關切與感佩，也是先總統蔣公對政大師生的讚賞與懷念所致。民國四十三年六月九日，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正式向行政院提出簽呈，以「建設臺灣，光復大陸，必須儲備各項專才」爲理由，請求在臺先行恢復設置國立政治大學，六月十日經行政院第三四六次會議通過恢復政治大學案，並隨即成立籌備委員會，由張其昀、黃少谷、陶希聖、陳雪屏、余井塘、蔣經國、倪文亞、嚴家淦、徐柏園等先生爲籌備委員。六月十五日旋奉總統正式核准定案。七月三日總統再以明令核派政大復校籌備委員，除行政院所報九人外，增派前政校教育長張道藩先生爲籌備委員（註三一），負責先期規畫政大設校事宜。十一月二十日政府任命陳大齊先生爲復校後國立政治大學第一任校長，並以陳雪屏、邱昌渭、崔書琴、陶希聖分任先行設立之公民教育、行政、國際關係、新聞四研究所主任，後陶希聖先生因故未就職，改聘曾虛白先生爲新聞所主任。並隨即錄取研究生五十六人，於十二月一日正式報到上課。

復校後之政大，其教育宗旨是在配合憲政建國政策，培養高級通才。因而復校後僅先行設立研究所招收大學畢業生，後來又經決定，把行政、國際關係兩所改爲政治研究所和外交研究所。民國四十四年奉教育部核准，政大大學部恢復招生，先行設立教育、政治、外交、新聞、邊政五個學系。在陳大齊校長領導下，政大在木柵校園之各項建築如圖書館、學生宿舍、教室、四維堂等次第動工興建，此後再逐漸添設中國語文、東方語文、西方語文、國際貿易等學系，而政治研究所也增設博士班，招收博士研究生。民國四十六年政大舉行第一四四次行政會議，決議成立文、法、商三個學院，隨即經教育部同意。爲配合商學院之設立，增設會計統計及銀行兩系，此外並設立一實驗學校，以供教育系研究實驗之用。民國四十七年，奉令增設財稅系，夜間部也參加夜大聯合招生。四十八年政大各類規章均已妥竣，學校人事組織步入常規，陳校長大齊先生以年高體弱，懇辭校長職務，教育部乃派劉季洪先生接任校長，政大規模又有進一步發展。其中除研究部增加財政、中國文學、公共行政、企業管理、地政、法律、東亞、統計會計、邊政、經濟、國際貿易等研究所外；在十多年中大學部先後增了公共行政、企業管理、地政、經濟、歷史、哲學、數學、心理學系，連同研究生人數，使政大在校學生人數到達六千多名。此外，政大更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合作協助下，在臺北市金華街設立了公共行政暨企業管理教育中心，協助政府及民間企業，推動我國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之發展。

民國六十二年十月，劉校長季洪出任考試院副院長，教育部聘請李元簇先生接任政大校長職務。李校長接任後，深感政大一直偏促於指南山下二十甲之窪地，既有淹水之患，又有發展之限，於是決心進行「上山計畫」，先行徵集行政院內政部主管土地之校友來校勘查校區附近山坡地之土質及地形，然後向教育部爭取經費，終於將山坡地八十多甲土地購買，使木柵校區一下擴大五倍之多。校地擴充以後，學校大型建築，循序興建，其中如研究大樓、女生宿舍大樓、中正圖書館及大型之體育館、學生餐廳，都是此一時期之產物。在校地校舍硬體建設之外，李校長極期望政大能成爲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領導機構，因而在擴展研究所方面，也不遺餘力，如新設三民主義研究所、歷史研究所皆是其例，而原有之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也於民國六十四年七月改隸本校，定名爲「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不久教育部委託本校辦理之「空中行政專科進修補習學校」，也開始正式籌設。

民國六十六年五月，李校長因出任教育部部長，教育部聘請歐陽勛先生接任政大校長。他繼續前任之「上山計畫」，先行開通了環山道路，修建渡賢橋，再在山上興建文理學院、新生大樓、男生自強宿、男研究生宿舍、風雨走廊、法學院及學生生活動中心，而女研究生宿舍及新的辦公行政大樓，也在山下落成或開工破土。此外充實圖書館藏書，採用電腦管理，擴大社會資料中心及語言中心、電子計算中心，加強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也是歐陽校長努力的成果。蓋一個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中心的大學，必須依靠豐富的研究資料和便利的研究工具，才能使它在學術領域和教育功能上，更有地位更為突出。

由於受任期關係，歐陽校長在民國七十五年七月辭去政大校長職務，返還他政大專任教授的本職。八月一日起，教育部改聘陳治世先生接任政大校長。陳校長接掌以後，除繼續前任所預定的政策之外，對於加強學生的讀書風氣，教授們研究工作之提升，均表示十分重視。他在新舊任校長交接典禮中，強調大學對社會所負擔的教學、研究、推廣和服務的四大任務，在努力改善教學和研究環境下，務期政大學術的成就，達到國際水準，並針對國家社會的需要，配合全國高等教育發展整體計劃，使文、理、法、商等科，盡量發展（註三二）。目前政治大學在量方量，有博士班的研究所有十所（另歷史所博士班已奉准籌設），碩士班之研究所二十三所，大學部分文理學院、法學院、商學院共二十五個學系，在學研究生有一千一百七十一人，大學本科在學人數為五千五百一十八人，此外尚有在職研究生及空中行專在學人數未列入，實可以說是政大有史以來，規模最大之時期。

六、政大在學術上的展望

在民國十年時，美國學者孟祿博士在北大演講「大學之職務」時曾指出大學之責任有三：曰傳佈知識，曰求應用人才，曰提高知識。（註三三）政大在以往六十年中，為了配合國家建設之需要，曾經隨軍政、訓政與憲政三個不同階段，在教育發展上雖作過若干修改調適，但在基本方向上，仍然着重於致用和務實路線。所以政大訓練出來之畢業生，在比例上以服務於政府公務部門者居多。這固然符合了當年政大創校宗旨在培養訓政建國人才的特色，在北伐統一、抗戰戡亂以及建設臺灣的歷程中，它對於苦難的中國，已盡了不可或缺的貢獻。但是在未來更長遠甚而永恆的歲月中，政大必須在學術文化的道路上，更加努力。

因為時代的趨勢，很顯然的是在邁向一個更專業化、更高層次的科學層面，也在走向一個更遼闊更開放的領域。在明日的世界裏，不但專精高深就是權威，教育和學術成果也將不再有國界種界。那時社會人羣要求於政治大學的，將不僅僅是在中華民國大學之林中，與眾不同，而如何在人類文化發展中，進軍世界輩聲於國際，才是今後「政大人」共有的期許。因此在校慶之日，吾人不應僅以政治大學以往六十年對國家社會之貢獻與成就自豪，而應在傳佈知識求應用人才之外，加強學術研究努力，使政治大學的功能和貢獻，由以往博得國內社會之喝采，進而獲得國際社會的讚賞。

慶幸的是，政治大學在臺灣復校以後，歷任主政者均已有一卓越之眼光，所以復校之始，即着重於研究部之發展，在從無到有極艱難的情況下，政大已興建了一座號稱臺灣第一的大學圖書館，另外還有一個十分出色的社會資料中心。此外更從民國五十七年起，即設立了一個學術合作推行委員會，先後在羅志淵、韋從序、朱建民、胡秉正諸先生的策劃下，與各國有名的大學建立連繫，使政大邁向國際學術合作交流的途徑。所謂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希望不久的將來，中國的國立政治大學，也將能躋身於國際知名大學之林，為全人類之福祉，提供更大的開發與貢獻。

附 註

- 註一：徐詠平：陳果夫傳，頁三三五，民六十七年臺北正中書局。
- 註二：均見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藏複印紀錄原件。
- 註三：按中央常會第九十三次會議中，原決議以曾養甫為訓育副主任，因曾奉令赴粵，乃改任谷氏為訓育副主任。
- 註四：參見羅家倫：「政大的誕生與成長」，羅家倫先生文存，冊一，頁六九三，臺北，國史館。
- 註五：「中央政治學校十年紀要」，「國立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彙編」，第一集，民六十二年，臺北。
- 註六：邱有珍：「田字房漫憶」，見「政大四十年」，民五十六年五月，臺北。
- 註七：張金鑑先生在「本校教育的發展」中說為七十九人，而前所引羅文中說有一百人左右，本文此處取張說。
- 註八：按當時蔣校長正以總司令身份，在新鄉、石家莊一帶督師，作
- 平漢、平綏、津浦三線對平津之總攻擊。
- 註九：見民國十七年六月七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二張二面。
- 註一〇：此處取自徐著「陳果夫傳」，頁三三六。
- 註一一：見張金鑑「本校教育的發展」，政大四十年，頁二八，民五十六年五月，臺北。
- 註一二：該方略案見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中央訓練部印行之「訓政法規方案彙編」。
- 註一三：同註四。
- 註一四：見「革命文獻」第五十六輯，頁四一三，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出版。
- 註一五：同註四。
- 註一六：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蕭錚回憶錄」，頁五二一六五，民六十九年，臺北中國地政研究所。
- 註一七：「中央政治學校十年紀要」，「國立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彙編」，第一集，民六十二年，臺北政大。

註一八：陳果夫：「中央政治學校改進計劃書」，引自徐詠平著前書，三七一頁。

註一九：徐詠平前書，頁。

註二〇：同註五。

註二一：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三日戴傳賢致丁惟汾先生書，見「國立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彙編」，第二集，頁一五八，民國十六年，臺北。

註二二：程天放：「主持政大教育的回憶」，「政大四十年」，民國五十六年五月，臺北。

註二三：張希哲，謝君韜：「小溫泉弦歌」，「政大四十年」，民國五十六年五月，臺北。

註二四：劉振東：「本校研究部」，民國六十二年五月，「國立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彙編」，第一集。

註二五：蔣中正：「中央政治學校創校的宗旨和教學方針」，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講。

註二六：「中央幹部學校簡史」，見「政大四十年」。

註二七：「本校大事記」，「國立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彙編」，第二集，頁五二六—五二七，民國十六年，臺北。

註二八：顧毓琇：「本校的改制」，見「政大四十年」。

註二九：楊希震：「政大遷校與大邑之戰的紀實」，「政大四十年」。

註三〇：同前註。

註三一：「本校大事記」，「國立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彙編」第二集，頁五三二。

註三二：見國立政治大學校刊第一七一一期，陳校長治世講詞。

註三三：「教育雜誌」，第十五卷二期，頁三。